

中华文化在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

——以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为视角

王丽敏,郝晓静

[摘要] 文化以价值观为核心,为软实力的构建提供指导性作用。在当代中国大陆价值体系的建设中,新加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通过发挥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构筑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中华文化;软实力;价值观;新加坡

[作者简介] 王丽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012 级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郝晓静,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北京 100044

[中图分类号] G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14)04-0084-04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这一术语,即相对“硬实力”而言,“软实力”系能吸引人的力量^{[1][6]}。此后,该理论越来越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重视与研究,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当前,软实力因素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如何发展和提升“软实力”,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李明江教授认为,行为方式是获得软实力的最佳途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力的软应用”观点,即通过对一定社会关系中所有可用实力的审慎应用来培养软实力;关于如何实现“实力的软应用”,本质上,价值观为其提供了原则性指导^[2]。

然而,由于传统价值体系和革命价值体系的双重式微,当代中国一定程度上陷于信仰缺失的状态……华侨华人的经验或许可以为中国大陆重建价值体系的努力提供可参考效仿的模式^[3]。新加坡作为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其软实力已得到国际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价值观构建折射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浓厚色彩。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具体涵义和运行机制的阐释,进而突出中华文化在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以期对中国软实力的构建提供借鉴意义。

84

一、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文化背景

1988 年 10 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第一次公开建议新加坡发展自己的国民意识,制定一套各种族和各信仰的新加坡人均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未来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1991 年 1 月,经过民众广泛讨论并经国会批准,新加坡颁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成为首个以白皮书形式提出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背景。

(一) 满足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要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出路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导的移民国家。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因素,时至今日,新加坡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多元性成为新加坡社会的显著特征,但并不能消除该国的中华文化底蕴。李光耀曾说:“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的。它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开始了。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民族的这个传统和文化。”^{[4][P424]}

可以说,中华文化并非唯一对新加坡产生影

响的文化,“其客观的文化和(华族)族群识别与中华民族抑或汉族已相去甚远”^{[5](P246)},但由于二者的同根性,中华文化仍持久且深刻影响着其价值趋向;新加坡解决问题的出路,也难以脱离自身文化传统的根基。以和谐求共生共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和而不同也成为新加坡维系多元社会结构稳定与和谐的文化选择。正是这种和谐的理念,在新加坡社会起着协调和适应的关键作用,使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得以形成并维系其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模式,从而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实现多元社会实现的价值诉求。

(二)应对过度西化带来的道德危机,呼吁中华文明精神的价值回归

西方是最早获得现代化的文明实体。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就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个人主义在给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的同时,却也逐渐导致一些腐化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而使社会和个人处于心理失衡状态。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受到个人主义的威胁与侵蚀,形成了对原有自我文化的逆反心理,并与传统因素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新的价值规范尚未确立之前,便出现了一定时期内的道德真空和危机。

正如亨廷顿所说,“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6](P68)},导致了新加坡需要从本土文化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新加坡拥有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其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化价值观。为应对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负效应和文化变迁上的西化倾向,政府呼吁中华文明精神的价值回归,以培养新加坡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价值观。

(三)根据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批判性地继承

20世纪前半期,无论是东方抑或西方学者,都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现代化的消极力量。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亚工业文明体系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学术界开始了对儒家伦理进行反思与再估价的过程。李振宏教授提出,文化评价的价值标准,只能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所面临的社会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只能被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基点上去进行选择性地吸收,而不能作文化形态的整体来支配现代化

的文化建设^{[7](P406,421)}。

对东亚社会来说,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东方文化具有非现实性,且西方“拥有的价值观不能成为一种提供协调伦理行为的或整合性的价值体系”^{[8](P377)},因此,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显得必要而可行。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经历一个对传统文化否定之否定的改良和更新过程。通过对中华文明蕴含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再认识,将其中的有益因素吸收进来,内化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而创建符合现代新加坡需要的新的文化机制或形态。

二、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内涵

国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民族的社会凝聚力,一种社会成员彼此休戚相关、具有共同传统和共同目的的意识。新加坡在鼓励发展族群文化、保留亚洲人的价值观之余,也强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突出共同性原则,使各个部分都能共享价值规范并在价值观的主体框架内找到归属感,以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其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培养国家意识,使不同族群具有统一国家的命运感,从而提高社会向心力

与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华文化倡导的是社会化的责任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惯例和实践方式。因此,就群体特性而言,它强调将集体利益置于重要和首要的地位。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新加坡承继了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的富有群体凝聚力的中华传统精神。通过培养“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使不同族群具有统一国家的命运感,从而提高社会向心力。

由于强调国家意识,新加坡的民主问题向来受到西方国家的诟病。然而,国家意识是一国对所属成员最基本的要求,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绝不容许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固然可贵,“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的先决条件不存在的地方通过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9](P120)}。因此,民主是一个社会化的发展进程,民主建设的选择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渐进式道路,即“东方式民主”。因此,民主意识与国家意识并非两个绝对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应该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有机体和共同体,如此才能使公民与国家达至平衡和谐的状态。

(二)倡导家庭观念,强调家庭的健康和稳定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从而提高社会凝聚力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家庭观念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之一。作为中华伦理观念的基础,重视家庭也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特征。家庭的稳固和团结,是华人社会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有力保障。新加坡政府通过大力倡导家庭观念,以强调家庭的健康和稳定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新加坡政府对家庭的认识与重视,不只是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更不意味着对个人权利、自由和尊严的忽视。中华文明虽强调群体伦理的价值取向,但并非否定个人主义的因素,而是主张个人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存在;对于个人来说,其价值发挥也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内,尤其是家庭关系之中。中华素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因此,自我的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即如杜维明教授所说,自我的实现,“虽然肇始于家庭的环境之中,却要求我们把自己的关系扩展到家庭结构范围之外,从而超越裙带关系,得以和更大的群体建立有意义的联系”^{[10][P107]},即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地方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

(三)彰显人文关怀,对个体以及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差异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而提高社会感召力

人文主义是中西文化共有的思想体系,但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基本内容上都有实质性的差别。中华文化中的人文主义,重视人的社会性,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也是群体存续的必要条件。新加坡在承认并接受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强调任何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对个体以及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差异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以保证在顺应多元化潮流的过程中,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感召力。

新加坡对人文精神的认识和实践,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主义内涵;“中国的传统之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在于其关心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于其所重视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11][P124]}。换言之,只有强调平等关系、尊重个体,才能超越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对此,新加坡积极倡导个体以及群体之

间的和谐理念和原则,将平等与尊重视为多元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和而不同”的最根本的人文精神。通过社会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来保障新加坡的稳定与发展,把新加坡建设成为既富进取精神又充满包容力的社会。

三、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运行机制

共同价值观的内容,广泛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增强国民对于新加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具体运行机制上,新加坡多渠道多举措并行,充分发挥社会各个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更将“信”、“育”、“责”等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融汇其中,从而构建培育共同价值观的合力机制,将其由理论转为实践。

(一)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营造良好法治氛围,为价值观的推行提供制度支撑

社会制度因素是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而价值体系则是社会制度建设的基础,只有同制度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结合起来,价值观方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因此,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将“好政府”视为衡量政党建设以及国家发展的中心维度。对新加坡人而言,拥有一个好政府也是最感自豪的事情。

新加坡“好政府”模式的确定,一方面是通过君子执政、精英治国体制的贯彻,以提高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引导社会向善的能力。对此,政府反复强调,“有好领袖才有好政府”,平庸的领袖不仅意味着政府的无能,也将意味着国家的衰亡;另一方面,由于人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固有缺陷,新加坡也始终坚持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通过鲜明的法治思维和完备的法律体系维护社会的主流道德,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以保障公开透明的社会管理模式,提高政府公信力。通过人治与法治的有效结合,新加坡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联系起来,从而为共同价值观的推行提供制度支撑。

(二)发挥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公民与道德教育,保障价值认知的自觉与自信

中华文化具备注重教育的传统。也正是教育的文化传承与更新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华文明享有千年不息、代代相传的生命力。可以说,教育在社会中发挥着培育、传播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主渠道作用。作为国家认同意识的共同价值观,自然成为新加坡首要的和基本的教育目标。在此基础上,政府把公民道德看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因此,新加坡将其教育模式发展为“公民与道德教育”。

“公民与道德教育”,一方面从公民角度强调对自我政治角色的认同,凸显社会和国家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从道德角度加强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将个人与国家、教育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有机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责任。因此,新加坡将教育活动在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展开,使三者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此外,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按照不同的认知阶段,进行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培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加强教育的科学性与实效性。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网络体系,使共同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保障价值认知的自觉与自信。

(三)树立媒体责任意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为价值观的推行提供宣传平台

作为大众信息的传播平台,媒体给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和沟通模式带来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在资讯呈现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交流和通讯手段的进步,降低了包括文化、价值观、政策和制度等在内的无形要素流动的成本,使其传播范围更广、传播对象更具体,从而为‘软实力’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和手段”^[12]。

关于媒体扮演的角色,李光耀指出,应“从各国不同的历史经验、政治制度、国家气质中发展出来”^[13](P228)],对新加坡而言,社会更应该注重和谐与整体,过度的权利和自由不仅不能使民众从中受益,反而易造成动乱和灾难;媒体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形成共识,而不是促进对抗;是促进建国,而不是磨损社会纤维。因此,基于新加坡的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政府确立负责任的媒体运作模式,强调新闻、言论自由必须注重其客观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社会教化的功能。通过树立媒体的责任意识,对社会和受众进行共同价值观的舆论导向,借以凝聚社会共识,为价值观的推行提供强大的宣传平台。

四、结 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非西方社会的迅速扩张,导致西方价值观遭到不同形式的反对以及非西方文化在全球的复兴。作

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华文化是包含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族群体的共同文化,海外华人社会在保全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新加坡通过对中华文化资源的转化和改造来构筑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实现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效融合,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较强劲的软实力;新加坡所彰显的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不仅是对传统的承继,也着力推动与现代化的接轨。当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既要有硬实力的增长,更要有软实力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文化形态的吸引力,是任何其他物质力量也无法替代的软实力要素。中华文化蕴含着巨大的能量,通过丰富民族文化内涵,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必然选择。借鉴海外华侨华人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2] 李明江.软实力:培养而非原生[J].南洋资料译丛,2011,(4).
- [3] 庄国土.中国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华侨华人[J].南洋问题研究,2011,(4).
- [4] 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
- [5] 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 [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7]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 [8] 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9]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10]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M].高专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1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 [12] 张辉明,张亮亮.软实力的经济效应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 [13] 韩福光,等.李光耀治国之钥[M].张定绮,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责任编辑:霁 月]